

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基于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分析

夏立平 谢 茜

摘要: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小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上升,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也进行了重构。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认为,小国主要通过软权力来大幅提高其国际影响力,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制度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为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一些挑战。中国应该欢迎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北欧国家,在亚投行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与它们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加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是构建“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北欧国家;伙伴关系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0.03.007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小国国际作用的上升,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也进行了重构。北欧国家是具有较大软权力的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超过其本身硬权力的作用。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重构及其主要内容

小国国际作用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主要论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国有时可能是外交强国。美国学者安妮特·贝克·福克斯(Annette Baker Fox)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寻找案例来证实小国有时在外交上能发挥大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①。美国学者戴维·维特(David Vital)认为,弱国的外交不一定弱,有时可能是外交强国^②。彼得·卡赞斯坦指出:“我们应该改变长期以来一直有的认识,即认为小国会永远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欧洲有的军事力量弱的小国会在外交的创造性和弹性方面表现不俗,比它周围的大国更出色。”^③二是小国联盟可以制衡大国。罗伯特·罗森斯坦长期研究小国联盟,分析了“小国联盟”的运作方式。他提出了“全面制衡”理论,认为小国联盟最主要的功能是制衡,制衡的对象可以是来自外部

收稿日期:2020-0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JZD058)。

作者简介: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200092;xialiping@tongji.edu.cn);
谢茜,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上海201306;qianxie@shmtu.edu.cn)

① Annette Baker Fox,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② David Vital, “The Inequality of States: A Study of the Sm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9.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4.

的威胁,也可以是联盟内部的冲突。他认为:“‘小国联盟’的成员国是否拥有清晰的共同威胁和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一起决定了这个国家集团的类型。”^①但罗森斯坦也强调:“‘小国联盟’只不过是一个用处有限的工具,难以采取较大的独立政策。”^②

小国国际作用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大国政治。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小国是不受专家学者重视的,甚至处于研究的边缘化地位,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关注的重点。肯尼斯·沃尔兹就认为:“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小国往往是大国博弈的棋子或争夺的对象,常常是政治游戏的筹码和权力交易的牺牲品。你可以对它们忽略不计,因为它们产生不了什么影响”^③。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小国的国际作用随之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开始处于重构之中,具有了崭新的形态。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小国利用软权力可以大幅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0年提出了关于软权力的概念。“软权力是指间接吸引其他国家自愿与己合作,从而实现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的权力。”^④他指出:“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⑤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从软权力角度,论述了小国在信息时代可以具有更大影响力。他们认为:“行为权力和资源权力是权力的两大来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它们的区别。传统上常常是把资源权力看得很重,而使行为权力受到轻视。信息革命改变着这一权力结构。”^⑥他们指出:“什么国家会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呢?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该国能引领全球化,二是该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这样该国的软权力就会强过其他国家。”^⑦软权力概念把权力相当于强制力的传统狭隘观念冲破,为研究国际关系及其中的政治权力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21世纪,国际政治中软权力的作用与硬权力相比较在上升,有着较大软权力的小国能在地区甚至全球事务中发挥远比其本身硬权力要大的作用。缺乏巨大经济实力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小国,也可以靠自己卓越的软实力去“四两拨千斤”,取得“以小制大”的效果。

而且,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小国的影响力。“信息权力”这一概念是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在1996年提出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成为软权力的核心。这两大变化正在深刻影响世界事务的革新。”^⑧近年来,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不仅将深刻、全面地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将改变传统的国际地缘政治。拥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拥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先进性的小国将与大国分享影响力。

其二,小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冷战结束后,小国对与它们国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非常关心,它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例如,近几年来,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议程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欧盟中的北欧国家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发挥了积

① Robert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56.

② Robert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69.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79-128.

④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p.22.

⑤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p.26.

⑥ Joseph Nye and Robert O. Keohane, "America's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p.128.

⑦ Joseph Nye and Robert O. Keohane, "America's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p.160.

⑧ 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p.28.

极作用。另外,它们也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正如杰尼·A·K·海(Jeanne A. K. Hey)指出的那样,小国倾向于在低政治领域参与世界事务,注重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多边合作机制来保障安全。当面临多个国家争夺或需要自己“站队”时,小国通常会选择中立或依靠大国,通过合作或牺牲部分利益的方式避免冲突^①。发达国家中的小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维护世界和平,它们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国际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大会”于1997年9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在这个大会上,近90个国家的代表在紧张激烈的谈判后,通过了意义深远的《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挪威在会议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小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例如,欧盟是有许多小国作为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东盟是东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它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以经济、安全、政治一体化为目标。小国在这两个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中可以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制度性权力是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行为体的权力,也指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实现对另一方的影响。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G. Patman)指出:“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外交资源,小国对外部环境更为敏感,多边合作组织成为小国弥补实力差距维护安全利益的低成本外交策略。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特别是大国的行为,从而减少大国对小国的控制。”^②联合国就为小国获得制度性权力提供了舞台。有学者就此指出:“联合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际舞台来为小国获取制度性权力,因为它是当代最具普遍性、权威性、代表性的全球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这与传统国际权力政治格局中小国只有从属地位和边缘属性完全不同。小国由于在联合国体系内有固定席位资格,也有投票权赋予的权力基础,还可以参与议题和议事日程的设置与选择,因此小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内与大国据理力争和讨价还价,迫使大国改变其行为和做法。它们这样做也是因为与大国相互之间的不对称相互依存,虽然它们物质性权力不足”^③。由此可见,小国可以充分运用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性权力,不再成为强国所掌握的制度性权力的支配对象,从而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

结构性权力是指行为者一方构造与其他方直接的结构性的能力。小国拥有的结构性权力,主要产生于地区安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地区安全结构中。小国参与地区安全互动开始于冷战结束后。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等认为:“在地区层面,现代大国与小国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是那个时期大国与小国的关系的绝大多数情况,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地区安全互动。第二阶段是在冷战时期,所有地区的安全结构都被嵌在世界两极对抗格局之中,地区小国很难有结构性权力。第三阶段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地区安全结构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小国对于地区安全事务的发言权扩大了,在地区安全体系中起的作用也增大了,这样小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结构性权力。”^④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小国在地区安全体系中获得了更多的与大国讨价还价的机会^⑤。因此,研究地区安全结构,不能只把大国因素和 大国战略作为唯一的考量,必须重视“小国变量”,而这一变量一般是由小国推行的安全战略、坚持的安全诉求和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所构成的^⑥。可见,与传统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不同,在和

① Jeanne A. K. Hey,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14, p.85.

② Robert G. Patman, “Alliance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7.

③ 王剑峰:《小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权力探析》,《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3期。

④ Barry Buzan and Ole Wa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19.

⑤ Ashok Kapur,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6.

⑥ 陈旭:《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权力论析》,《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0期。

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凸显出和平性、独立性、合作性、制度性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二、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下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小国国际作用的理论进行了重构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北欧国家的国际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表现形式。

(一) 北欧国家利用软权力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本文从政治地理意义使用北欧这个名词。北欧包括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冰岛五个国家,它们都是北欧理事会成员。北欧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位于最高之列,人口密度在欧洲则相对较低。挪威、丹麦、冰岛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前列。从人口来说,这五个国家可以算是中小国家。但它们又都是具有较大软权力的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超过其本身硬权力的作用。

北欧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地区,也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以科技推动发展。该地区的公众整体素质很高。北欧五国科技水平先进,在全球科研和制造业创新中,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分别排第三、第七、第八、第十九名,是高度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①。这种科技、教育和工业实力,使它们具有较大的软权力在某些国际事务中执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发挥着超过自身硬实力的影响。芬兰利用其永久中立国的地位,成为一些重大国际活动的举办地,发挥了搭台作用,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一定贡献,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例如,《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是1975年7-8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加拿大和30多个欧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了该文件^②。该文件有助于冷战时期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又如,俄罗斯总统普京2018年7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赫尔辛基进行了会晤。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首次美俄正式峰会^③。北欧其他国家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北欧国家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处于世界比较前列的位置,这使得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在世界5G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华为和中兴公司分列第一和第三,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分列第四和第五。为了夺取华为的5G领先地位,美国正在考虑各种方法,包括获得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控股权。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表示:“美国及其盟国应考虑采取非常不同寻常的举措——获得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控股权,用以抗衡中国华为在下一代5G无线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④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在5G领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且,瑞典、芬兰、挪威、冰岛和丹麦这五个北欧国家努力强化在5G领域中的合作,试图在欧盟甚至世界争取领先地位。2018年5月,五个北欧国家的总理(首相)签署了一份合作信函。在该文件中,五国承诺:“5G部署需要大量投资以及适当的监管框架。我们作为北欧各国的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要把北欧建成世界上最一体化的5G地区,也是第一个5G地区。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将致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全球创新指数(GII)发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05675218228474747>, 访问日期:2020年1月19日。

② 引自李道刚、喻锋:《欧安会/欧安组织框架下的人权与安全——基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法理分析》,《法学家》2008年第5期。

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06153990707648950&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0年1月20日。

④ 《为对抗华为 美司法部长建议投资爱立信和诺基亚》, https://www.sohu.com/a/371185175_234937, 访问日期:2020年2月8日。

力于为 5G 和数字化在公共领域的推广和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北欧国家之间通过更密切的合作推动 5G 的普及,将优先安排为本地区 5G 的投资。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北欧 5G 空间。”^①可见,一旦北欧成为欧盟内部第一个也是最一体化的 5G 地区,将对欧盟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北欧国家在 5G 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迅速发展,使它们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 AI)领域也获得长足发展,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和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北欧现在是欧盟中人均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瑞典、丹麦和芬兰均处于前列。北欧国家对人工智能在国家层面的使用方式不一样,但都主要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来推动发展经济,很少触及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同时,北欧国家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北欧地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较大潜力。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引领性技术之一,北欧国家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应用,将进一步提升其硬权力和软权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二)北欧国家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

北欧国家通常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对外援助、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参与国际维和等,参与全球治理。

瑞典奉行“小国大外交”,支持经济全球化,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瑞典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推动联合国改革,重视提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它关注国际热点问题,希望通过提供发展援助、参与国际维和等方式发挥影响。它积极参与欧盟事务,支持欧洲一体化,是欧盟成员国和北约“增强合作伙伴”关系国。近年来,它更加重视发展同新兴国家的关系^②。瑞典还是 21 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从 1975 年开始,其每年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就超过了联合国所要求的 0.7% 的目标,2009 年则达到了 1.1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属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 DAC)成员中排名第一^③。瑞典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诸多做法和行为,使其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典范。

丹麦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发挥自身影响力。它视联合国、欧盟和北约为其外交的三大支柱,视美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视北约为其安全保障,积极拓展以北欧合作为基础的环波罗的海合作。丹麦重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强调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发展各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关系,积极推行“气候外交”,重视对外发展援助^④。

挪威参与发展援助历史悠久,在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中占有重要地位。挪威是经合组织中三个满足援助开支占国民总收入 1% 的国家之一(其他两个是瑞典和卢森堡)。挪威重视增加对脆弱国家的援助,外援优先考虑人道主义援助、教育和保健等。挪威政府认为,向世界最脆弱国家提供援助对帮助最穷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国际安全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⑤。

冰岛虽未加入欧盟,但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及申根区成员,在欧洲经济区框架下积极与欧盟开展合作,与北欧国家保持传统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⑥。

而且,北欧五国的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发展迅速,环保技术发达。这使它们在一些全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上有底气和能力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2017 年 6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

① 《5 个北欧国家签署合作,共同致力引领欧洲的 5G 发展》,m.elecfans.com/article/638591.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8 日。

② 《瑞典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594/1206x0_679596/,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6 日。

③ 黄梅波、朱丹丹:《瑞典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2011 年第 5 期。

④ 《丹麦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62/1206x0_679064/,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6 日。

⑤ 黄梅波、陈岳:《挪威对外援助政策及管理机制》,《国际经济合作》2011 年第 6 期。

⑥ 《冰岛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8964/1206x0_678966/,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6 日。

黎气候协定》。北欧国家包括芬兰、挪威、瑞典、冰岛和丹麦对此非常不满。2019年1月,它们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努力达成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为此它们将加强合作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更快实现“碳中和”^①这一重大目标;推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共同努力开发有效的和具有全球影响的各种零排放技术,在这一进程中让工业和企业发挥主导作用^②。北欧五国在声明中还表示随时准备展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领导力,这种展示包括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特别是要深化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③。

(三)发挥独特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北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

北欧国家制度性权力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利用联合国气候大会,推动《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和实行。北欧五国为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做出了努力。北欧五国领导人与世界160多个国家领导人一起,于2016年4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了这一协定。北欧国家也在最早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的发达国家之列。

其二,充分利用北欧部长理事会和北欧理事会加强相互间合作。北欧五国都是北欧部长理事会和北欧理事会成员。近年来,它们注重加强在这两个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北欧部长理事会于1971年诞生,它是由北欧国家组成的、以合作为宗旨的政府间论坛。北欧理事会亦称“北欧委员会”,是北欧五国的议会间组织,也是五国政府的协商和咨询机构。其宗旨是:讨论有关北欧各国的共同利益问题,探讨合作途径,向北欧部长理事会和北欧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并促进建议的实现,以加强和扩大北欧各国间的合作。北欧理事会和北欧部长理事会是北欧五国可在次地区行使有利于己的制度性权力的平台。例如,北欧理事会于2017年11月通过决议,在北欧地区采用共同电子身份证系统。北欧电子身份证是北欧五国通用的,也得到北欧五国的相互认可。北欧五国公民可用北欧电子身份证在跨国工作、开设银行账户、留学时验证身份。

其三,北欧国家正作为一个整体,加强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北欧部长理事会于2018年5月发表《北欧—地中海地区人工智能宣言》,该宣言的政策目标是:“开发和促进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各国旨在就技能开发、数据访问、标准和原则展开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在欧洲数字单一市场中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监管,并通过北欧部长理事会促进合作^④。同时,北欧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在启动方式、规模等方面具有较大相似性。它们都通过私营创新机构、高校等科研单位、公共组织与政府相互合作的方式,推动产业在技术、人才与资金的全方位发展。可见,产业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使北欧各国具有较大合作面。

北欧国家结构性权力影响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在“北欧防务合作联盟”框架内加强沟通协调。“北欧防务合作联盟”于2009年成立,最初只是北欧诸国之间就防务与安全政策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性机构,成员国包括北欧五国。后来逐步发展为北欧的国与国之间军事交流、合作与互动的联盟组织。早在2007年,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北欧国家就试图寻求扩大未来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和提高效率。2014年10月,挪威防务与安全专家索尔瓦尔德·斯托尔腾伯格(Solwold Stoltenberg)提出了“北欧防务与安全委员会”的概念,主张其职责是确定并推进具体的合作进程,为北欧防务合作制定出详细的方案。2015年,

① 碳中和是指通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等方式把这些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

② 《北欧五国签署气候声明加快实现“碳中和”》,《人民日报》2019年1月28日,第16版。

③ 《北欧五国签署气候声明加快实现“碳中和”》,《人民日报》2019年1月28日,第16版。

④ 引自《政策简报·北欧地区》,《人工智能半月刊》2018年第20期。

瑞典提出“2020年北欧防务合作联盟远景规划路线图”，提出由两三个有实力的国家牵头的重点军工合作项目，是防务合作的基础以及提高联合防务能力的保障。瑞典还建议：强化北欧地区的海空合作，改良早期预警系统；组建模块化的“北欧—波罗的海战斗群”；将网络空间防御作为北欧国家安全合作中的重要一面^①。在2015年3月举行的“北欧防务合作联盟”会议上，国防装备合作协议是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瑞典、挪威、冰岛、芬兰和丹麦五国防长签署了该协议。协议规定，北欧国家将加强在武器采购、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各国扩大跨境培训、共享军事基础设施，建立联合监测北欧领空的机制，以应对俄罗斯空军^②。该计划实施后，北欧各国之间的联合防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另一方面，在北欧国家内部加强双边安全沟通协调。例如，在参与多边合作以外，瑞典和芬兰正在强化两国海空军力量之间的联系，加强两国防务合作，以便形成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的联合军事力量。两国于2015年2月共同提出报告，建议深化双边军事技术合作，包括两国在陆军、空军、海军、通信、人员管理和后勤等方面密切合作。它们计划建立可涵盖战略、政治及实战层级的情报交换系统，强化两军互信基础和工作沟通，双边规划未来军事合作必须包括危机管理行动计划、预备役部队、管理运营、后勤支援等；如有必要，两军可进行联合战略规划^③。

三、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根据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北欧国家国际作用呈现出新特点，这使得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与北欧国家发展关系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北欧国家推行一定独立性的和平外交或平衡外交，有利于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北欧国家不希望依赖超级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而是寻求实行有一定独立性的外交政策。从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来说，这是由于北欧国家在一定硬实力基础上其软实力有较大幅度提升的原故，这使得它们不需要完全以国际体系主导大国马首是瞻，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就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等。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批西方国家中也包括它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逐渐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中国与丹麦2008年10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与北欧国家建立的第一对双边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果并获得长足发展。中国和芬兰201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共同建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补充。以此为基础，双方共同致力于构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支持在条件成熟时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支持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及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进程，推动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④。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北欧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参与。2017年5月，丹麦、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参加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进入新的更快发展阶段。2015年4月，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先后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2017年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高层互访明显增多，双边关系定位不断提升。2017年11月，中国与北欧间首

① 肇启笠：《北欧强化防务提防俄罗斯》，《中国国防报》2015年2月17日，第3版。

② 田聿：《芬瑞组建军事同盟防俄》，《中国国防报》2015年8月11日，第3版。

③ 田聿：《芬瑞组建军事同盟防俄》，《中国国防报》2015年8月11日，第3版。

④ 《中国与芬兰发表关于建立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www.chinanews.com/gn/2017/04-05/8191991.shtml，访问日期：2020年2月18日。

趟中欧班列——芬兰科沃拉至西安线正式通车^①，现在已经形成常态化对开班列。班列的开通不仅有助于“中国制造”走向北欧，以及芬兰等国的优质产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北欧互联互通的水平。

2. 北欧国家对外关系的和平性与合作性，有利于实现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合作共赢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北欧五国作为中小国家也主张和平与合作。它们顺应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希望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实现合作共赢。

一方面，这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高层互访日趋频繁，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与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分别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以及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了双边混合委员会机制，并定期开展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磋商。

在欧洲，北欧国家最早与中国开始自贸协定谈判。相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冰岛(2005年)和挪威(2007年)，是欧洲国家中最早与我国分别开启建立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国家。2006年、2008年，中国和冰岛、中国和挪威先后启动自贸协定谈判。2013年4月，中国与冰岛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

北欧国家还率先与中国开启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并成为较早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发达国家，从而推动了北欧先进技术和企业进入中国市场。1982年，中国和瑞典签署两国投资保护协定，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个投资保护协定。此后，中芬、中挪、中丹、中冰先后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总的看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规模稳定，互补特征明显。从进出口商品构成来看，双方互补性很强。中国与北欧国家双向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日益多元。北欧国家对华投资项目的质量和强度普遍较高。经贸合作成为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最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双方在北极事务上的合作。中国和芬兰决定加强两国在北极地质学、北极海洋产业、海洋与极地科学研究、海上安全、旅游业、环保技术和航运等领域的科技和经济合作。2012年8月，中国第五次北极科考队乘坐“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时任冰岛总统接见了中国科考队。这也是中国北极科考队首次正式访问北极国家^②。2013年12月，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成立，签署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合作协议》。该中心致力于中国与北欧国家在北极事务方面的协调合作，促进北极的可持续发展，增进各国对北极及其导致的全球影响的理解和认识^③。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主体建筑结构于2016年10月封顶^④，并于2017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位于瑞典基律纳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接收站，历经两年建设，于2016年12月投入试运行^⑤。

3. 北欧国家先进的科技实力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科技对于国家权力增长和国际体系的影响，被国际关系学者重视和强调。北欧国家在许多科技方面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它们也对中国的大市场有需要，有利用它们的科技优势发展与中国合作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国需要发展与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把中国的潜在大市场转变为现实大市场。这使双方具有合作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日益密切。北欧国家一直是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① 《中欧班列(科沃拉—西安)开行》，《西安晚报》2017年11月14日，第5版。

② 《中国“雪龙”号科考船首次访问北极国家冰岛》，http://www.china.com.cn/newphoto/2012-08/17/content_26263124.htm，访问日期：2020年2月18日。

③ 《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成立 召开首次成员机构会议》，http://www.gov.cn/govweb/gzdt/2013-12/12/content_2546677.htm，访问日期：2020年2月18日。

④ 《海洋局：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http://www.gov.cn/govweb/news2_2008_844042.html，访问日期：2020年2月18日。

⑤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站投入试运行 为我国首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中国科学报》2016年12月16日，第1版。

截至 2018 年年底,北欧国家对中国投资金额累计达 113.4 亿美元,北欧国家也从中国获得 103.8 亿美元的投资。双方投资结构日趋均衡^①。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创新研发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智能交通、城市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农业、林业、有色金属、地热、海洋与极地等领域尤为突出^②。北欧国家也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它们国内发展业务。

中国与北欧国家发展关系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如下两方面:

其一,当前世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中负面因素增加。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多次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还企图分裂欧盟。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使世界生产链遭到破坏。这些都对中国与北欧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其二,美国企图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使得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受到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 年)》列出的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美国还要求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不能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特朗普政府还表示,不会与采用中国华为公司技术及设备系统的国家合作^③。2019 年 4 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再度向北约成员国喊话,要求它们认真应对 5G 网络安全方面的议题,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④。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和北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受到挑战。

总的来说,中国与北欧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面临的机遇要远大于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克服挑战,构建“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

基于构建“中国—北欧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借鉴重构后的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中国与北欧国家发展关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相关国际组织中以及相关倡议方面,加强合作。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小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结构性权力影响力。中国与北欧国家首先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在诸如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类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项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还应该欢迎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北欧国家,在亚投行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冰上丝绸之路”倡议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加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各方面合作。

第二,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小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手段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与中国同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一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它们均为世贸组织成员,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中既是推动者和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中国与北欧国家双方要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坚定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应该拓展合作和加强协调,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旗帜鲜明地维护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以实际行动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双方应深化在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发展等议题上的沟通。在实施好现有的中国和冰岛自贸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这一协定,推动中国和挪威早日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使自由贸易成果尽早惠及双方人民和企业。

第三,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领域相互合作、交流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小国特别重视发展信息产业,这是它们提升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捷径。北欧国家已经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它们的影响力,因此更加重视发展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

① 晏澜菲:《中国与北欧三国共挖投资新机遇》, <http://www.comnews.cn/article/ibdnews/201909/20190900019124.shtml>, 访问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② 安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国际贸易》2018 年第 10 期。

③ 门洪华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 7 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年,第 233-234 页。

④ 刘平:《“盟主”美国喊话盟友“应对中国挑战”》,《中国青年报》2019 年 4 月 10 日,第 4 版。

当前,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家之间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北欧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包括5G技术的发展中具有一定优势,它们致力于共同引领欧洲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某些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双方在这些领域有利益交汇点,应该加强合作。双方还可以在第三国拓展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项目合作。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a Reconstructiv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Small States**

Xia Liping Xie X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P.R.China;
Liberal Arts Colleg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P.R.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world has entered an era with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its theme, especiall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small states has been grow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small states has been under reconstruction: Soft power can greatly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small states; small states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by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mall countries exert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structur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further enhanced the influence of small countries.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to develop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China should encourage the Nordic countries as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AIIB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at the AIIB,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olar Silk Road,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an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all fronts in the Arctic. The goal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is to construct China-Nordic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Keywords: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small states; The Nordic countries; Partnership

[责任编辑:李春明]